

一、政治

- (一)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 (二) 关于“三个代表”和加强党的领导
- (三) 关于私营企业者入党的问题
- (四) 关于民主、人权问题
- (五) 中美撞机事件
- (六) ~~非典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北京申奥成功

二、经济

- (一) 中国经济是亚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 (二)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 (三) 拉动内需，促进出口，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增长
- (四) 经济特区——浦东
- (五) 关于市场经济问题
- (六)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 (七) 关于西部开发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一) 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全面改革
- (二)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打破世贸组织的平衡
- (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东南亚产生影响
- (四) 中国企业改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五) 中国农村改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六) 中国金融改革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四. 科技

五. 港澳台问题

(一) 香港

(二) 台湾

六. 外交

(一) 中日关系

(二) 中俄关系

(三) 中朝关系

(四) 中美关系

七. 问题与建议

(一) 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与建议

(二) 农业改革中的问题与建议

(三) 金融领域中的问题与建议

(四)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五) 水资源的短缺及影响.

一. 政治

(一)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始于1978年,比苏联要早10年。在此之前(1968年),曾出现过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之春。不幸的是,它没有被视为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开始,而是遭到了军事干涉。众所周知,这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犯下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在摒弃了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当上了中共领袖之后,中国最先从根本上思考并历史地、目标明确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时代(1978—1997年)的现代化是对破坏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反应。

诚然,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迫切需要变革。然而问题在于,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在什么方向上进行改革?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想,由邓小平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能恰到好处地说明中国改革的实质。这种理论源于毛泽东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条件结合起来的的思想。这就形成了对如下一些问题的新的理解: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维护和发展(会面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之路在哪里?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再加上20年中国顺利进行的改革,就构成了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和作用的核心。

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我想系统地将之概括为如下诸点,其中每一点都比这种概括具有丰富得多的内容。

○我想首先指出的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的理解。对中国来说,这一阶段不少于100年。据认为,要到21世纪中叶,中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

○既不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任务是找到本民族的道路和模式),也不照搬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

○社会和国家齐心协力地在新技术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具有历史活力并取得成就的决定性条件。

○制定并实践了中国经济改革分三步走的战略。

○把社会主义同市场联系起来,实现了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市场与调节的结合,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竞争真正发挥作用,使中国经

济融入了全球经济。

○中国向世界开放,为外国投资创造条件,开办了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免税区——中国向世界敞开的“大门”。

○在改革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和个人,采取了波浪式而非直线式(同时)发展的方针。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一定机制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政治的稳定和强大的国家是顺利推进改革的一个条件。国家现代化也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主要目的是扩大和完善民主,其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及中国历史与文明的价值观。

○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是实现今天的现代化并为明天推资的推动力。这种发展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并有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战略。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结果,将形成怎样一个社会、怎样一种制度,既向西方也向东方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革新了的社会主义,还是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变体?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和在将来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将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这就是说,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始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必需的经济基础尚未建立起来,这还需要很多时间、很长的过程;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实现能为公民保障各种自由和权利,比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更大的民主;精神发展、道德关系和文化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和规模。这一过渡时期将很漫长。过渡时期的社会不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它既非纯粹的资本主义,也非纯粹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

（亚历山大·利洛夫：《欧洲现实社会主义为何失败和中国的改革为何成功？自由主义的破产》，

新华社索非亚，2001年5月25日电）

新世纪的中国战略：以 2000 年为例

随着 21 世纪的来临。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战略。但中国遇到的挑战更加严峻。旅美学者李诚认为中国在 2000 年的战略调整集中在三个方面：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西部大开发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每一个战略的提出都具有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战略的优先顺序

中国领导人知道。随着台湾岛内代际变化，台独将获得更大的支持。90 年代台湾县市长选举就已经表明民进党有取代国民党的潜力。在 2000 年的选举中，三件事的发生推动了民进党的上台。第一件事是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宋楚瑜决定独立竞选。第二件事是资金丑闻对宋楚瑜政治号召力的削弱。第三件事是李远哲对陈水扁的公开支持。

随着岛内问题的发展，中国政府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先后发表了“台湾问题白皮书”以及不同形式的讲话。在作者看来，强硬的态度和言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态度强烈，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尤其如此。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防止台湾独立的政治意

义以及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

陈水扁上台后，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在外交上，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周边以及欧美国家，以限制台湾的影响。在经济上，中央政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台资的进入。所以，尽管台湾选举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关系，但 2000 年的台湾投资增加了。同时，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经常提醒台湾人注意台湾的股市，因为从陈水扁上台后，股票不断下跌。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决策者一直推动两岸更频繁的交流。在军事上则积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用江泽民的话说，中国的战略是做好“两手准备”。中国应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来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同时要坚持原则。在大多数决策者和官方知识分子看来，虽然台湾问题与经济发展现在有同等的重要性，但统一应该服务于而不是损害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目标。

二、西部大开发：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开发西部的战略并不完全是新的。实际上是邓小平在改革早期制定的战略计划的一

部分。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个地区不可能同时实现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发展一些地区经济中心,使那些有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人力和自然条件等初始优势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按照邓小平的计划,南方和东部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率先发展起来。当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接着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帮助中部和西部。

在 2000 年春天的全国人代会上,中国政府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把经济建设的重心从东部沿海各省转移到西部地区。通常来说,西部包括 9 个省和自治区,分别是:陕西、山西、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宁夏、新疆和西藏。它们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57%,人口的 23%。以前用于沿海经济特区的政策将扩展到中国内陆。

作出这种战略调整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沿海和内陆之间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在 2000 年,西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全国的 60%。按照国家统计局 2000 年的统计,5%的最富者控制着银行私人储蓄的近 50%。这些新贵分布在沿海地区。同时,大约 90% 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在西部地区。

其次,疲软的国内需求是导致战略转移的另一个因素。在过去几年中全国需求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中国领导人认为,除非全国各地的消费需求增加,否则中国没有理由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如果国内需求不能成为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激励因素,那么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就无法维持。

第三,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内陆地区受到了经济挑战。按照美国一家投资银行的一项研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开始的 5 年可能有 400 万人失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国有企业中的工人。这意味着中国内陆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很多国有企业和更多的农业部门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西部建设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减少失业压力。西

部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族关系。此外,恶性犯罪案件的增加不利于社会安定,这也需要经济发展来改善。

第四,广大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在过去 10 年中一直恶化。西部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全国有一半以上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在西部都可以找到。但是,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缺乏资金,西部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黄河和长江上游位于西部,但是出现了严重的土壤流失和流量减少问题。根据官方统计,西部地区被侵蚀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80%。

为了开发西部,中国政府在 2000 年安排了 70% 的国债和 70% 的政府资金。此外,70% 的外来直接投资投向了西部。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起步。当然,现在就认为西部开发将顺利进行还为时过早。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开发西部对于中国来说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中国似乎已经走上了实现更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三个代表”与重新认识共产党

2000 年 2 月在广东考察时,江泽民首次公开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概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继续是中国改革的关键。如果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人民的利益,那么就能够克服所有困难并保持领导地位。在他看来,随着“新鲜血液”的注入,中国共产党应该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面前领导中国人民。此后,“三个代表”很快成为官方媒体中使用最频繁的词。到 2000 年 12 月,在人民日报网站上,关于“三个代表”的文章有 230 多篇。

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显然是关键性任务。江泽民在一次会见高级干部的会议上号召,应该从其他共产党和列宁党那里汲取

失败的经验。在他看来,苏联共产党、许多东欧共产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的失败是由内部问题导致的。特别是这些政党没有回应新的挑战以及代表新趋势的能力。

中国当局大刀阔斧地铲除腐败官员的行动反映了领导层提高共产党形象的决心。按照官方数据,从1993年以来全国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以9%的速度增加,纪律处分的数量每年增加12%。

共产党领导人不仅希望从失败的政党那里汲取教训,也希望从成功的执政党那里学习经验。英国工党的转型及其在选举中的获胜推动了“第三条道路”热潮在中国学术界的兴起。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被翻译成中文并成为畅销书。

“三个代表”的提出实质上是扩大党的权力基础,把知识分子、企业家包括进来,并实现技术官员统治的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中国精英转变的回应。实际上,知识分子、企业家、特别是技术官员早就成为最重要的精英集团。

知识分子现在在共产党中占很大比例。在6300多万共产党员中,有1100万人员大学毕业,比例达到17.8%,比1982年多4.5倍。从总体上来说,知识分子现在站在政府一面,在台湾问题和对美国的态度上尤其如此。

中国的企业家向上的社会流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到2000年,中国有大约150万私营企业家和3000万个个体工商户。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全国或省人大代表。官方数据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100个私营企业家代表,政治协商会议中有113名代表。

网络的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多年轻、有文化的企业家,而且有大量海外留学生随着网络热回国创业。这对于中国的发展肯定有利。在2000年,政府资助了专门的项目来鼓励海外学子,尤

其是鼓励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海外学生回国创业。这些信息技术专家和金融专家在新世纪代表的是最先进的生产力。

尽管大部分回国人员主要对商业或自己的专业感兴趣,但是有些人可能很快被赋予政治责任。江泽民等人曾经提出,回国学生应该成为干部选拔的主要来源。一些出色的回国留学生可以被快速提拔为高级干部。在他们看来,选拔这些有国外学习经历的青年干部符合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技术竞争中成为强者的根本利益。另外,这些归国人员正处于有利的年龄段。

四. 结论

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21世纪的第一年是重新思考战略的一年。对中国来说,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合法性等问题是根本性挑战。而且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台湾的关系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整体过程,开发西部可能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有深刻的意义,西部开发有可能使当地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三个代表”思想可能改善了党的形象,尤其是有国外教育背景的年轻一代进入领导层后,会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

当然,这些乐观的判断需要未来的检验。但无论如何,扩张军备不是中国应该选择的方向。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就是错误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俄国经济的崩溃。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似乎充分意识到这个陷阱。重新做战略思考有助于中国的领导人关注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并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中国不能承受太多的战略错误。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政府系教授 李 诚)

《新亚细亚中国战略》2000年

为《亚洲观察》2001年第1期

木 易 编译)

(二) 关于“三个代表”和加强党的领导

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纪念活动的总结,中国主席江泽民 7 月 1 日发表了长达 90 分钟的讲话,这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尽管他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十分开放,但在政治方面却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灵活性,共产党政权依然以铁腕统治着这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国家。

江泽民在表示继续沿着毛泽东和邓小平开创的道路前进的同时,发展了他的“三个代表”理论,进而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理论。共产党这样做是希望在近 20 年来因实行经济开放而出现的新阶层人群中确定自己的合法性。

作为对来自上面的这种口号的反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经叔平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工商联在近 20 年就不会有如此快的发展!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6 月 30 日在头版也重复了这样的讲话,以证明中国共产党路线的成功。

江泽民还许诺下大力气对付在党内和政府内肆虐的腐败问题。他说:“会体党员都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中国日报》6 月 30 日指出,自 1989 年以来,共有 43.7 万名中共党员因为贪污腐败而受到惩治,而现有党员人数为 6400 万。该报最后得出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越变越好,它已摆脱了令东欧遭受打击的那种命运”。

(记者韩石:《中国共产党自我颂扬》,法国《解放报》7 月 2 日)

12001年

9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伟大设计师的邓小平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阐述,完成了一部分理论修改工作。其继承人江泽民则进一步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清除,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参照。

这一新思想的提法叫“三个代表”,江泽民想把这个新思想一代代传下去。这种新思想规定,面对21世纪新挑战的党应该具备三个“代表”性:“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谓“先进的生产力”,江泽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在具有增值能力的技术部门中能给中国“经济改革”带来活力的那些富有创新和竞争力强的新生力量。在暗会地谈到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的问题时,江承认,所谓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意味着要牺牲“落后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牺牲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重工业。

所谓“先进文化”则比较容易理解。江在这里再次提出了“精神文明”这个概念,与其相对应的是“物质文明”,这种调整早在20年前就开始进行了,因为当时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其它一些形式的“没落思想”开始抬头。

江在今年年初发掘出了一种新提法,这种提法借鉴了孔夫子的思想,即用“德治”来补充“法治”。

江思想的第三个基石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表明他们担心由于干部的腐败,党会失去与基层民众的联系。江说,党的干部应该发护他人,而不应只想著发财,或非法滥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江要求建立党的强有力领导,没有它,国家将会陷入极大混乱。这也表明,与此相应的政治改革始终还没有作为当前任务提出来。

总之,江泽民的新理论只是力图“振作”党的精神,而党的唯一使命是不应受到任何量疑的。党的总书记注意到了下述事实,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变化。他也提到新近出现的那些阶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

这些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党的干部”一起成为了“先进生产力”,他们在世人中,在党内都得到了人们的充分承认。江泽民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内容:他正式认可私营业主可以加入共产党。江说,不应该根据他是否拥有

产业来判断他是否能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主要应该看这个人是否愿意执行党的路线。

给“资本家”恢复名誉可能是庆祝建党 80 周年的一件大事。在北京举行的许多历史展览都谈到了一些企业家在建设民族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中央电视台播发了关于私营企业家的报道,说这些人在当他们的亿万富翁和忠诚于党这两者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在这方面党正在谋求使这部分人重新发挥“活力”。

(弗雷德里克·博班:《在建党 80 周年时中共深化其意识形态的蜕变》,法国《世界报》,2001 年 7 月 2 日)

关于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织展开了空前的学习运动。在学习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江泽民讲话表明了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等把社会的多样化反映到党的身上的方针,但显然并不是要放松“一党专制”。

政府和军队各部门从 2 日起通过“党组”掀起了学习运动。各省的电视台播放了正副部级干部对江总书记讲话表示支持的党组会议的情况。很少公开的党组会议在电视上播放,这还没有先例。

江泽民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说,应把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另一方面,他还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会四分五裂,实现不了现代化。他强调决不能接受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讲话要求党员拥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拥护党中央的权威。学习运动的展开也是为了遏制党内一些人强烈反对私营企业家入党等的不满情绪。

但是,存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命题。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存的党保持“高度一致”,这无疑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试验。

清水美和 :《中国在学习“江讲话”运动中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日木《东京新闻》,2001年7月5日

(三)关于私营企业者入党的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今天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应该允许私人企业主和中国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的其他成员加入该党。

这篇讲话还表明，放松对私人部门限制的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几年来，尽管作出了努力来扭转国有企业失败的趋势，但是许多国有企业还是垮掉了。随着这些国有企业的失败，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认当这个国家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私人企业在吸收国有部门过多的劳动力和提高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例如，私人公司的股票现在可以自由地在这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上市——尽管这么做的步伐极其缓慢。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达利·扬说：“这是一篇开创性讲话，它重新阐明了党的作用及其与社会其余部分的关系。它将被认为是一份为党的建设定调子的极其重要的文件。”

达利·扬说：“如果这个党能够吸收最好的和最有才智的以及在经济上最有影响的人，同时遏制腐败——这篇讲话的另一个重点，那么，它将能够在更长的时期内扩大它的统治。”

石克雷：《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美国《纽约时报》，2001年7月20日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示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一指示表明了针对国内外局势的激烈变化,试图超越旧的阶级观框架,向广大人民群众渗透,从而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战略。可以说,如果这一指示成为党的正式路线,在党章中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该党将向“国民政党”化迈出一步。

江总书记在1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再次表明了把他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新指导思想作为今后的指导方针的立场。

江总书记说,“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但他强调:“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关于今后的入党标准,他说,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他表明了比起“阶级”,更重视是否是对党有用的人才的想法。

自去年“三个代表”的思想提出以来,围绕私营企业家入党问题的议论迅速高涨。可以认为,江总书记的指示将给私营企业家入党问题带来很大影响,也将为正式允许作为“资本家阶级”的私营企业家入党开辟道路。

保守派认为这会“使党变质”而一直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今后根据江总书记的指示,正式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则将成为该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杉山祐之:《中共将向“脱离阶级化”迈出重要一步 私营企业家入党也将成为可能》,

日本《读卖新闻》,2001年7月2日)

江泽民主席今天宣布,共产党将接受民营企业家的共产党员。政策的这种转变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企业家在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共产党领导人江泽民是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作出上述宣布的。这一宣布突然结束了过去两个月旨在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场宣传运动。

共产党估计,大约有 11.3 万名共产党员已经在开办企业,而且大多数人是在入党之后开办企业的。因此江泽民作出的这项宣布多半是现实的反映。不过,它也标志着一个竭力设法在一个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其重要性的组织(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允许中国民营企业享受从中国股市筹措资金的更为优惠的条件。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将从国营体系朝着私有化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中国问题分析家说,这项宣布是共产党在其政策对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不能产生影响的时候为扩大其队伍而作出的另一种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实行了 23 年的开放已经造就了一批新的力量,并形成了共产党觉得难以控制的一些经济阶层和特殊的利益集团。

民营企业开办的公司的产值相当于中国 1 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它们还雇用了成百上千万从丧失生命力的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

在作出这项宣布的同时,共产党最近还发表了一篇有关社会秩序崩溃的报告,并且开展了压制中国媒体的运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它 1949 年战胜国民党军队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转变,即从国有金业控制的经济朝着非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转变。去年,非国有企业的产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20% 来自于其 120 万家纯民营企业。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概将在年底之前加入)并因此将面临西方人在 19 世纪 40 年代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来最大的外部挑战,这种转变的速度将

进一步加快。

目前中国社会比 1949 年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人们可以上因特网,外国的思想也得到了快速传播。

共产党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力也在迅速下降。首先,随着 80 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土地归还给了农民。后来又随着城镇工作单位的消亡,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或破产,或停止运转,因为它们无法再展开竞争。

潘文:《中国允许资本家入党》,副题为《共产党意识到民营企业的崛起》,美国《华盛顿邮报》,

2001年7月2日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国家主席)表示,对于那些沿着党的路线奋斗前进的社会优秀分子,应该接纳他们入党。江总书记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包括私营企业家、外企中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会上确认了允许这些人入党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一向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允许作为有产阶级的私营企业家入党。长期以来,私营企业被附以资本主义的追随者的意思而被蔑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脱颖而出,留学归国的优秀人才也掀起了创业热潮。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党外,那么在21世纪,党的衰落将不可避免。正是在面临现实的危机感的背景下,江总书记作了以上重要讲话,实现了政策的大转换。

截止到去年年末,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在全国共有176万家,其经济总值已发展到约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4的程度。从1999年起,私营企业可以参与到贸易、交通、通信及金融等领域,其发展的空间变得更加广阔。

长期以来,大多数国有企业为人员过剩、福利负担及庞大的债务等问题所困扰,而新兴的私营企业则没有这些负担和问题,这就是新兴私营企业的优势所在。国家统计局去年的统计报告认为,在196个工业业种中,除了关系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军需产业和电力工业等,国有企业应该从其余146个业种中逐渐撤离。

因此,没有理由让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处于低位。去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就为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做好了准备。“三个代表”理论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其中的“最广大人民”不仅是指工人和农民,而且也包含私营企业家在内。

继去年起在全国开展的“三个代表”理论学习活动,今年中国共产党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学习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活动,以使新的方针人尽皆知,保持党内统一。

(《中国向全球化快速迈进》,《~~昨~~经济新闻》,2001年10月1日)

政治

(四) 关于民主人权问题

第 页

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为可能。这些虐待劳工的事件代表着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侧面，许多人有理由对此表示关注和忧虑。然而，对这一现象的注意已经模糊了全球化一些最积极的方面。

民主化和经济发展

从人权角度为扩大同中国的贸易进行辩护是简洁和令人信服的。美国对中国人权可以发挥的最大影响将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实现。跨国公司，特别是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正在影响着与民主和人权正相关的四个方面，即：经济繁荣、以绩效为基础的雇佣惯例、信息分享和协同工作、领导能力和变化。通过同中国做生意，美国将会加速这种“作为有益的副产品的人权”的实现，继续促进正在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并促使民主和人权在中国兴旺那一天早日到来。

并非外国人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会产生有益于人权的副产品。只有那些希望在中国赢得消费者和商业市场的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世界级公司致力于中国的长期经营，它们常常在中国投入巨额资金，支付的工资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同时为自己的多数是年轻的、技术成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

外国公司之所以被吸引到中国，还主要因为这里有充足的低技能、低工资的劳动力。这种“成本最小化”公司一般来说是全球销售公司，它们通常在中国只有最低限度的物资设备和微不足道的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之间为吸引这种投资进行的竞争是激烈的，被驱动从事这些工作的通常是受教育很少的农村移民。当地政府在实施现有劳动保护条例方面有时不太严格，因为制造商能够很容易地将工厂转移到那些更加宽松的地方去。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利益冲突也是原因之一。经济动机和工人本身的脆弱性使严重虐待工人成

贸易对中国民主化最明显的影响是经济方面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理论家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后民主政治才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最近，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证实：一般而言，经济繁荣是一个稳定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民主的前提条件。

最近的台湾“总统选举”说明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随着几十年强健的经济发展和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台湾人民在政府与日益开放和自由的选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终得以实现。中国大陆居民和领导人无疑意识到了台湾茁壮成长的民主，并理解随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尽管在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和普遍的贫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人均年收入按照同等购买力计算已经接近3000美元，迅速逼近可以维持民主的水平。通过援助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贸易和投资也帮助创造了一个拥有独立于国家权力和利益的“中产阶级”，后者是民主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

“管理精英”的崛起

在中国的外国贸易和投资不仅促进了私人部门的繁荣，而且是在私人部门法则之下做到这一点的。通过建立在功利制基础之上的雇佣、解雇和晋升，跨国公司给它们的人灌输着个人业绩和能力最为重要的思想。这种对个人价值的强调也在创造着一种“管理精英”：一个官衔和受过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稿纸(20×20=400)

15